

蘇東坡寓惠和陶詩譯釋

蓝锦新



苏东坡寓惠和陶诗译释

蓝锦新

《惠州教育》编辑部出版

鸣 谢

本书由惠州市旅游冷气安装总公司总经理薛斌先生赞助出版。

特此鸣谢。

蓝锦新 1994 年元旦

目 录

序

——谈东坡的惠州和陶诗…………… 王启鹏(1)

奋然行之而不疑

——浅谈苏东坡在惠州的爱民思想发展…………… (11)

苏东坡寓惠和陶诗 47 首译释…………… (20)

1.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 (20)

2. 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 (35)

3. 和陶《贫士》七首…………… (55)

4. 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 (71)

5. 和陶《咏二疏》…………… (74)

6. 和陶《咏三良》…………… (77)

7. 和陶《咏荆轲》…………… (80)

8. 和陶《移居》二首…………… (84)

9. 和陶《桃花源》…………… (89)

10. 和陶《乞食》…………… (93)

11. 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95)

12. 和陶《酬刘柴桑》…………… (98)

13. 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 (100)

14. 和陶《时运》四首…………… (103)

15. 和陶《答庞参军》六首…………… (109)

后记…………… (118)

序

——谈东坡的惠州和陶诗

惠州大学学报主编

王启鹏

苏东坡的和陶诗，是他晚年创作成就最高，艺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完成的。他曾经说过：“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可见东坡是把他的和陶诗当作千古文坛上的一种首创文体而严肃地创作着的。东坡是借陶渊明之酒杯来浇自我之块垒。正如他在《答程全父推官六首》中公开表明他的创作意图：“仆焚毁笔砚已五年，尚寄味学，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原来，东坡写《和陶诗》就是为了“陶写伊郁”。可见他的和陶诗都是“有为而作”的。东坡的和陶诗有什么特点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和陶诗的内容

苏东坡在惠州的和陶诗，共计 15 题 47 首。由于他和陶是为了“陶写伊郁”，故他“未尝规规于学陶”，完全是“随意而遇”，“手写其口”的，只要他在生活中遇到了和陶渊明相似的情景，他的诗思就油然而兴。如他贬惠州一年后，衣食渐窘，重九将至，而樽俎萧然，就引起了和《贫士》的念头。白鹤峰新居将成，欲迁居其

中,又和《移居》诗。由于他具有“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的品格。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读东坡的和陶诗便可帮助我们找到他寓惠期间的思想轨迹。因为这些诗作都是他纯真感情的表露。东坡惠州和陶诗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反映他的寓惠生活和惠州的风貌

宋代的惠州,人称为“蛮貊之邦”,“瘴疠之地”,封建统治者一向都是把“罪恶”较大的臣子才贬谪到岭南去的。当时,东坡年老多病,自认为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把苏迈、苏迨两房子孙遣送到常州,与长子苏迈诀别,处置了后事。其悲苦状态可想而知。但当他在赴惠途中听了人们对惠州情况的介绍,以及他到惠州时又受到惠州人民的热烈欢迎时,他的恐惧心情才渐渐消失了。当他游览了惠州秀丽的山水田园时,他禁不住写道:“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一山一水,已令诗人赏心悦目的了。一牛一羊对诗人来说,似乎也特别有情:“昔我初来时,水东有幽宅。晨与鸦鹊朝,暮与牛羊夕。”所以,他对惠州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果然,他同惠州人民相处得非常好。你看,诗人在惠州生活得多好:“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洄潭转埼岸,我作《江郊》诗。”诗人在惠州能够生活得如此愉快,除了惠州的风景秀丽之外,惠州百姓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敦厚诚笃,毫无机心,人人都讲道德风尚也给他很大的安慰。他赞扬惠州人民是:“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所以,当他游白水山后回到水北荔枝浦时,看见那累累荔枝时,八十五岁的老人问他:“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东坡便欣然答应,禁不住写道:“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有酒持饮我,不

问钱有无。”由于诗人与惠州百姓关系非常融洽，所以当他生活有困难时，就会出现“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和“无酒沽我，或乞其邻”的情形。

（二）抒写自我的苦闷矛盾的个性形象

惠州的风土人情虽然十分美好，使苏东坡的心情稍为平静下来。但是，作为一个自幼就有“奋厉有当世志”和“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的苏东坡来说，他是不甘心命运对他这样的安排的。可是，客观现实又不容他改变。于是，他在和陶诗中多次抒写了他那自我的苦闷矛盾的个性形象。他把自己比作是“穷猿”，是“疲马”，自称是“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他的《和陶贫士七首》集中地反映出他贬谪到惠州后的苦况。所以他决然要辞世绝尘，“独与渊明归”。于是，他也象陶渊明那样，把自己的住宅布置得非常幽静，终日学习陶渊明饮酒、作诗，沉浸在“葺为无邪斋，思我无所思”和“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颜。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的悠悠自得的乐趣中，从而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几经仕途挫折的东坡，晚年尤喜学道，讲究养生之术，随缘委命，以顺应自然。到了惠州后，他对葛洪的崇拜不亚于渊明，他的《和陶读山海经》就是他“读《抱朴子》有所感”而写成的。他说：“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并要“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他把葛洪、陶渊明都引为自己真正的同道，他把葛洪的《抱朴子》中“谈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祛邪却祸之事”视为“奇书”、“良友”，精心研读之后，不禁发出“学道恨晚”的慨叹，并确信“长生定可学，当信仲弓言。”

然而，苏东坡的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他作为一个忧国爱民的正直官吏，早年就希望能为改变北宋那积贫积弱的形势而付出

努力。“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觐，旧学终难改。”“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的矛盾心情始终缠着他。他甚至情不自禁地高喊：“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岁暮似有得，稍觉散亡还。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缠。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你看，六十一岁的东坡还念念不忘为国出力呢！可是，身不由己，要出力的机会也得不到，多么痛苦啊。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晚年的东坡虽然热衷于学道，讲求长生之术。但他又多次指出“人生可以长生不老”是欺人之谈。

他在初到广州的蒲涧寺时，对始皇到处寻访长生不死之药的愚蠢做法也给予嘲讽：“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明知神仙不可学，人不可长生久视，可东坡为什么还要学道呢？这里面除了东坡自己说的“平生学道，专以待物之变，非意之”的意图外，我们在他的和陶诗中不就看到了一个妄图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充满着苦闷矛盾的诗人形象么？

（三）探讨人生价值，评价历史人物

人总是要死的。但怎样活得才有意义？是否长寿就有意义？东坡的惠州和陶诗对这个问题是作过专门探讨的。陶渊明在《己酉岁九月九日》感于自然物之代谢，发出这样的感慨：“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大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之慨。而苏东坡却不是从人生命的长短来看问题，而是从人活着的价值来看问题。他在和陶诗序里明确地提出：“胡广饮菊潭而寿，然《李固传·赞》云：其视胡广，犹粪土也。”他将胡广和李固作了对比：胡广慑于大将军梁冀的威势，不敢正言。而李固坚持正理，宁死不屈。所以东坡赞扬李固精神，批评胡广的为人。在和陶诗中借菊花的形象，提出自己的人生理想：“黄花与我期，草中实后凋。香余白露甘，色映

青松高。”他认为做人要做到象菊花那样“后凋”，要有“余香”，要有青松般的高洁之色。所以他禁不住再次大声斥骂：“伯始（胡广字伯始）真粪土！”可见东坡是很讲究人活着的价值的。

最能表白东坡对人生价值看法的，莫过于《和陶咏三良》。秦穆公死，用了 177 个人殉葬，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和针虎也在内。当时的人为了哀念他们三人，赋了《黄鸟》诗。后人曹植等也曾作《三良》诗。陶渊明的《咏三良》强调的是忠君和报恩思想，对“三良”以身殉秦穆公之葬，认为是“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君臣遇合之情，应予大肆颂扬。但东坡却认为“三良”的殉葬是“忽作鸿毛遗”。他解释说：“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他认为皇帝也有好坏之分，君王的所作所为也不一定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苏东坡是把忠于社稷的“大节”放在首位的。一个真正忠于国家的臣子应该象晏仲平那样，“事君不以私”，还要象魏颗那样“不用乱命”，而“三良”不管秦穆公是否尽心社稷而盲目殉葬，这只能是愚忠，不值得提倡，故死得轻如鸿毛。

二、和陶诗的艺术特色

不少论者都以“平淡自然”这四个字来概括东坡和陶诗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并用东坡评价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评语来评价东坡的和陶诗。这虽然恰当，但我认为仍未道出造成东坡和陶诗平淡自然风格的原因。究其实，“真淳”才是东坡和陶诗的本质特点。他曾经说过：“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求食，饱则具鸡黍以迎客。古

今贤之，贵其真也。”与之相比，东坡感到“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陶渊明的这种人格，东坡学到了，并且在和陶诗中表现出来了。这真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具体说来，东坡惠州和陶诗的“真淳”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衡口出常言，平淡里面蕴藏着无比丰富和意味深长的情意

东坡和陶诗的语言平淡自然，这是形成和陶诗平淡自然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他的语言平淡自然，则又是由他的性情“真淳”而造成的。东坡说：“衡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他认为只有冲口而出，不假修饰，才能保持语言本色。但，这个“常言”并不是随便的信口开河，而是指“根底深厚，性情真挚，理愈积而愈精，气弥炼而弥粹”的意思，故一经出口，便蕴含着无比丰富和意味深长的情意。如《和陶归园田居》中的“环州多白水”一首。

这首诗从句式来说，并无特别，是一般的常用句；从用词来说也多用平常口语，并无艳丽的辞藻和着意锤炼的字眼。全诗语言流畅，一气呵成。粗粗一看似乎平淡无奇，但细细咀嚼一下，就觉得意蕴深厚，非细心体味不行。象这样的诗句很多，它们都能曲尽事物之妙，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给读者以朴素、自然、真切之感。究其实，东坡能造成这种平淡风格的原因就是“我手写我口”。他的感情完全是从胸中自然流出，不假修饰。

苏东坡和陶诗的平淡风格还表现在描写景物似不经意，随意所遇，信笔挥洒。他笔下的物象都是保持着自然之姿，丝毫没有斧凿的痕迹。起初一读，觉得平平淡淡。但一经进入意境后，便觉得它非常美，具有静谧、和谐、恬适等特点。这样的意境，与陶渊明隐居的山水田园诗最为相似。如东坡笔下的惠州：“环州

多白水，际海皆苍山。”“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多幽静而美好。这些景物是作者的情与客观的景自然妙合的结果。由于它已达到了“境与意会”的境界，所以诗人不必对境加以改造，而只保留其自然的形态，“意”便在其中了。这便是东坡以写实造平淡，以平淡寓深美的意境描写方法。正所谓“涵美之纯，痕迹进化”。而这种意境，也只能是东坡性情真淳毫不做作所产生的结果。

（二）意随心出，毫不掩饰，于平淡中饱含着深刻的哲理

在北宋诗坛上，东坡是写哲理诗的高手，他往往通过一件细小事物来说明深刻的道理。他在惠州的和陶诗，当然也不会放弃这一种艺术形式。更何况，性情耿直的东坡也决不会说那违心的话的。他往往是意随心出，毫不掩饰，表白他对问题的看法。如他读了葛洪的《抱朴子》后，感到书中的好些材料不真实，于是他禁不住写道：“口耳固多伪，识真要在心。”当他读了陶渊明的《咏三良》后，感到对“三良”评价不正确时，他又发了一通议论：“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陶渊明在《咏荆轲》中认为，燕太子丹报秦之志未遂，秦国未灭，只是因为荆轲的剑术荒疏，如果荆轲的剑法高明一点，那大功不就可以告成了吗？苏东坡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秦的灭亡，是由秦本身的罪恶造成的：“功成志自满，积恶如陵京。灭身会有时，徐观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与纓。”说得多么深刻透彻啊！这些诗句的语言都是平常无奇的，但由于它们都抓住了事物的本质，“酝酿之熟，火色俱融”，故一经东坡点明，也就具有无穷的哲理了。

（三）妙想出于真淳，于平淡的字句中充满着神奇的想象

由于东坡的天资高，才华横溢，加上他早年喜读《庄子》，曾对“雄放不择”的李白、“集大成”的老杜赞赏备至，到了晚年，虽

然他认为陶诗的造诣要超过李白、杜甫。但是，他那种富于想象，充满着神奇幻想的浪漫主义诗风，在和陶诗中仍然保留着。如他在《和陶贫士七首》中则由自己的贫想到陶渊明的贫，想到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之事。更有意思的是，他竟然由于“重九伊迺，樽俎萧然”想到在重九这一天，国君以花糕法酒赐近臣之事，提出了这样一种极不公平、贫富极端悬殊的事实来：“遥怜退朝人，糕酒出大官。岂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阳，徂岁惨将寒。”你看，东坡的想象多么丰富。又如，东坡在《和陶己酉岁九月九日》中，“与客作重九”时，由菊想到人的寿命，由人的寿命又想到人的生命价值，而因想到《后汉书·李固传》中的李固和胡广两位在议立汉祀斗争中根本对立的人物，从而提出了要做“草中实后凋”的“黄花”般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东坡用于抒写这些神奇想象的语言，又是普普通通的“常言”。可是，它发自内心，毫不雕饰，读者感到十分亲切。而这样淳真的语言，当读者一旦在脑中获得诗人赋予的形象后，那诗歌的思想内容就起了质的变化，就觉得它蕴含深意，韵味无穷了。

（四）于真淳的情感中和冲淡朴素的风格中见诗人的豪逸气质

陶诗和东坡的和陶诗的风格都可以说是平淡自然。但他们两者的风格又有很大的不同。陶渊明以真率写诗，在诗中表现了自己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很少愤激之语；东坡和陶诗真率的态度可与渊明相匹敌，但和陶诗真实地自然地披露了他那旷达的胸怀，展示了他那丰富而高远的精神世界，话中有“骨头”的特点是陶渊明不能和苏公相比的。就拿内容相近的陶诗和和陶诗来说吧。《归园田居五首》是陶渊明写他归田后的生活的。第二首写他归隐家居的情景，没有与俗交往，只和农人谈些庄稼生长之

事，过着宁静闲适的生活。而东坡在第二首和陶诗中也是抒写他谪居后的惠州生活，但他的内心是不平静的，豪逸气质时时不能不表露出来。请看：“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陶渊明会说这样的话么？不会的。所以纪昀点评说：“二句乃似昌黎。”至于对生活上的穷困，两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的。两人的酒樽都已空了，陶渊明在《岁暮和张常侍》中只能说：“屡阙清酤至，无以乐当年。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言中虽然有些不满，但仍是“温柔之音”，而东坡却不同了，不仅发发牢骚，而且有某种程度上的反抗了：“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缠。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你听，东坡的抱负多大。象这类例子很多，不用多举。所以，东坡的和陶诗是在真淳的情感中和在平淡自然的诗风中蕴含着一股豪情逸志，真是“不见老人衰惫之气。”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东坡的惠州和陶诗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不是“规规于学陶”的凑数物，而是诗人伟大人格的产物。“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些和陶诗都是诗人“陶写伊郁”的心迹，是诗人的艺术追求。他在《与二郎侄》信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东坡在这里强调，他这种“平淡”的风格是从“气象峥嵘，彩色绚烂”中化来，是由于“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所以，他把他的“平淡”解释为“绚烂之极”，这是很值得我们体味的。因此可以这样说，东坡晚年的和陶诗是他晚年思想和艺术成就的重要资料。而和陶诗这种艺术形式也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独创，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古诗翻译，历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难点，而蓝锦新老师却乐

于干此事,《苏东坡寓惠和陶诗译释》一书,是他对苏东坡寓惠作品研究的成果。该书言简意赅,时有新解,加上不乏文采,故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也是一部文学作品。这本书可让读者读后了解苏东坡贬寓惠州后的思想和创作情况,这是一部了解东坡和陶诗的很好读本,也是研究苏东坡和陶诗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相信同志们读后,一定可以得到好些新的启示。

蓝锦新老师是我的前辈,也是我们编辑部的同仁,一贯治学严谨,对自己的作品往往是思之再三,才拿去发表的。现虽年事已高,退休了,但仍笔耕不已,这本译释是他的第三部著作了。因为我们经常谈论到此书的写作,并嘱我写个序言,思之再三,我就以这些文字对苏东坡的和陶诗作一个概括介绍,并对蓝老师的这本书作一个简单介绍,望能得读者的接受。

奋然行之而不疑

——浅谈苏东坡在惠州的爱民思想发展

苏东坡原名苏轼，是北宋前期杰出的诗人、词家和散文家。他出生于公元1036年12月19日，即宋仁宗景祐三年。卒于公元1101年7月，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享年66岁（照中国古代计算年龄方法，生下来算一岁计算）。苏东坡是四川省眉山县人。

苏东坡是公元1094年10月被贬到惠州的。在公元1097年7月再贬到海南西北岸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原儋县）。他在惠州居住还不够三年，但惠州人民始终敬仰苏东坡。自宋朝以后，惠州人民建立或重建纪念苏东坡的处所，如在惠州桥东白鹤峰建有东坡祠、德有邻堂、思无邪斋、东坡亭、东坡井、林婆卖酒处；惠州人民奉祀苏东坡灵主的地方也很多，如景贤祠、迟苏阁、丰湖书藏的苏祠等；在惠州西湖的苏堤、东坡放生池、鳄湖的永福寺及在江北的白水山，都是人们游览的苏迹。这些名迹屡废屡兴。近年来还有以苏东坡命名的事。如在桥东学背的嘉祐寺，原建为惠州市第八小学，前几年改为“东坡小学”；在东新桥头文笔塔旁原是惠阳县政府的楼宇，前几年改为“合江酒楼”；有些商店或商品还以苏东坡命名的，如东坡酒楼、东坡厅、东坡扣肉，等等。1983年春在惠州西湖孤山顶上建了有一定规模的“苏东坡纪念馆”，近年来重修了苏堤、西新桥、王朝云墓、六如亭，等等。至于历代文人所写的诗文碑碣赞颂苏东坡的，就有千百篇，真是

琳琅浩瀚。

为什么八百多年来惠州人民一直怀念着苏东坡呢？

从宋人费衮在《梁溪漫志》中的一段叙述，我们就可以见到丝迹。费衮说：

“东坡居惠，勇于为义。昔陆宣公谪忠州，杜门谢客，惟抄药方，盖出与人交，动作语言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慎之，后人得罪迁谪者均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其在惠也，程正辅广东提刑，东坡与之中表，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诸军阙营房，散居市井，窘急作过，坡令作营屋三百间。惠州秋米六万三千余石，漕符乃令五万以上折纳现钱，坡以岭南钱荒，乞令人户纳钱与米各从其便，博罗大火，坡以林令在式假不当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专委令备复仓库，仍约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桥，坡以为吏孱而胥横，必四六分了钱，……乞选一千吏来了此事。又与广帅王敏仲书，荐道士邓守安，令引蒲涧水入城，免一城人饮咸苦水，及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官政，亦易指为恩怨，而坡奋然行之而不疑，其勇于为义如此！谪居尚尔，则立朝之际，其可以生死祸福动之哉？”

这段文字叙述了苏东坡寓惠时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勇于为义”，“奋然行之而不疑”。有史料可查的主要业绩：

① 见到惠州驻军营房紧缺，占用了民房，时常滋事，为了解决此事，苏东坡便上下奔跑，请上级拨款建营房三百间，结果完满地解决了军队扰民的问题。

② 政府以高粮价为标准征收税赋。当时惠州地区秋季丰收，米价下跌，农民要交粮六万三千余石，官吏不收实物，要五万多

石粮改收现金，又要按粮价高的时候计算，即农民欠一斗粮税，就要卖出二斗粮才能顶上粮额。为了解决百姓的困难，苏东坡就上书给当时朝廷派到南方（广州）担任提刑的程正辅，指出官吏这样做法是加重农民负担，建议政府要改为“钱米两便”的收税办法，解决了百姓缺钱的困难。

③公元1096年，即绍圣三年，大年初一博罗发生大火，全城都被烧毁。当时衙门需要重建，又要放粮救济灾民，建立灾民临时住所，同时要防止抢劫。但地方政府强征民力和物力，乘机剥削百姓。苏东坡及时将情况告知程正辅，要程正辅通令当地政府不准强征民货，要维持市场货源，安定民众生活，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他非常焦虑，尽力协助做好善后工作。同时，还勇于为当时的博罗县令说公道话，使他免受拘罪。

④见到城乡百姓来往城乡不便，就建议、支持建造惠州两座桥。一条跨越大江，叫东新桥，一条跨越惠州湖泊，叫西新桥。在当地的太守和县令支持下，自己带头捐资，上工地查察，为惠州的繁荣和发展及人民生活提供极大的方便，对惠州西湖景区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

⑤因建桥挖掘出不少的骨骸，这些骨骸都是百姓和军人，是无主孤骨，为了使这些死难者安息，苏东坡建了一个大冢，将这些骨骸重新安葬，并为这些无名死者写了祭文，希望这些英灵能像家人一样，长久相处，为惠州人民了结了一宗心事。

⑥见到广州人民像杭州人民一样，饮不清洁的水，苏东坡就向广州太守王古（敏仲），推荐邓守安道士为引水设计工程，自己还参加总体规划，解决了人民饮水卫生问题，减少了疾病流行。

⑦因南方多发生瘟疫，为了与疾病作斗争，苏东坡闲来无事，到乡间四处采药，还施医赠药，解除群众遭受疾病袭击的痛